

1942年6月端午节前一天,南京,一个名叫刘峰的年轻人拎着简单的行李,走出了下关火车站。他刚从上海来,受中共江苏省委的派遣,到南京秘密开展工作。此时的刘峰完全没有想到,仅仅7年后,随着百万雄师过大江的胜利号角,他就能光明身份,毫无顾虑地行走在这个新生的城市里。

2009年3月25日,阳光轻轻洒进南京市级机关医院的病房里,93岁高龄的刘峰,在向记者谈起当年“潜伏”在国民党心脏地区的往事时,仍唏嘘不已:“其实刘峰是我的化名,我的真名叫汤锦黻。当时地下斗争是很艰苦的,要随时准备牺牲。在南京解放前,南京的党员已经发展到2000多人,分布在各条战线上,他们在迎接解放军渡江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。”随着他的讲述,那一段段惊心动魄的往事,又清晰地从历史长河中浮现出来。

在采访结束之前,记者抛出一个向往已久的问题——1949年4月23日这一天,南京的地下党在做些什么,他们是怎样度过南京解放前的短暂而又漫长的一夜?刘峰含笑给出了答案:“我们都是在家中,静静地迎来了南京的黎明。”因为,该做的工作都已经安排好了。

快报记者 白玉磊 朱俊豪

★ 潜伏,在黎明前的黑夜里



2009年3月,刘峰在接受快报记者采访

玄武湖畔与“重庆”号的握手

1948年9月初的南京,玄武湖畔,一位30岁左右、头戴礼帽、身着长衫、右手拿着报纸的人,正在一座小桥头踱步。远处走来一个面带稚气的年轻人,径直来到长衫人身边,几句低语之后,两双手紧紧握在了一起。

在这次握手五个月,让蒋介石震惊的一件大事发生了。

“渡江战役前,国民党海军最大的军舰‘重庆’号巡洋舰在吴淞口起义,使幻想固守长江防线的蒋介石大吃一惊,这里面,就是南京的地下党起了关键性的作用。”

南京是国民政府的首都,因此党中央早就重视在南京搞好情报工作。1946年南京市委成立后,情报系统就开始接受上海局及南京市委的双重领导,时任南京市委副书记的刘峰对很多情况都很了解。

“重庆”号原是英国皇家海军地中海舰队的旗舰,1948年被英国政府送给国民政府。国民政府为了接收和使用好该舰,派出邓兆祥和许多官兵在英国学习了两年多时间。“重庆”号的舰长邓兆祥为人正派,很受官兵拥戴,但因不是蒋介石的嫡系而受到排挤,舰上官兵的文化程度也较高,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和爱国思想。

当时,已经有一个叫毕重远的共产党员打入了“重庆”号,他是1945年入党的,受南京学委系统派遣,考入国民党海军的潜艇训练班,去了英国学习。他去参加潜艇训练班的申请,还是刘峰批准的。

刘峰回忆说:“‘重庆’号回国后,我派了一位叫陈良的同志跟毕重远联系,告诉他国内形势,要他团结进步士兵,根据形势发展,相机行事,有可能就争取起义。”

多年以后,毕重远也对那段经历记忆犹新:“此后,胡玉民(注:陈良的化名)两次约见我。为了使党及时掌握‘重庆’号的行踪,我建议以如意里我姐姐家为联络点。考虑到一旦‘重庆’号起义成功,到达解放区能迅速与党组织接上头,我们定了个用于接头的党名‘汪健’。”

后来,毕重远和一些进步士兵秘密串联,组成了二十七人的“士兵解放委员会”。1949年2月17日,“重庆”号奉命在吴淞口外停泊补充弹药,准备溯江而上,到江阴阻止解放军渡江。2月25日凌晨,“士兵解放委员会”决定发动起义。毕重远想法得当晚值班,得到武器库房钥匙,顺利拿到武器。之后,他们争取得到了邓兆祥的同意,在吴淞口率舰起义。

“御林军”起义的触发点

同时,另一项秘密策反行动,也在有条不紊地展开。执行这次任务的地下党员叫李益之,他的策反对象,是刚担任首都警卫军第九十七师师长的王晏清。

1948年9月,南京城佐营的一处民宅里,化名为陆平的李益之,以《大公报》记者的身份,和王晏清见了面。李益之能顺利地见到王晏清,全靠了民宅主人的帮忙,他非是旁人,正是王晏清的舅舅、民主党派人士邓昊明。九十七师素有“御林军”之称,师长一职都是蒋介石亲自决定的,但这次蒋介石却看走了眼,王晏清一直心向共产党,只是此前一直无法取得联系,这次可算是得偿夙愿。

2009年3月,面对记者的采访,王晏清的小女儿王怀义仍清晰地记得父亲说过的当年故事,父亲曾说:“我在邓舅家见到一位姓陆的同乡,此后也经常联系,感觉这个人就不简单。那天邓舅突然告诉我,老陆真的是个共产党,他为了工作方便,已经向邓舅公开了身份。因为事先有思想准备,我没有大吃一惊,但感情上仍十分激动,找了几年的共产党,现在总算找到了……”

在党组织的安排下,王晏清积极地筹划起义工作。1949年3月,陆平再次在城佐营邓家约见王晏清,明确告诉他,“你以后的行动归陈毅司令员指挥,到时候陈毅同志会通过电台命令你如何行动。”两人还商量用哪首唐诗作密码,王晏清不假思索地说:“葡萄美酒夜光杯。”

遗憾的是,就在数日之后,有些风声被走露出去,引起了一个人的怀疑。这个人正是张耀明,国民党的首都卫戍司令。张耀明把王晏清叫到卫戍司令部查问,卫戍副司令覃异之因同情王,叫他先回家,“随传随到”。王晏清脱离虎口后,飞车回到东门街17号家中。考虑到起义企图已经暴露,开放江防正面迎接解放军渡江的计划已不可能实现,他当机立断,于当晚发布全师渡江游击的命令。蒋介石闻讯后,下令出动飞机、坦克和步兵追赶,致使王的部队受到损失,大部分士兵逃散,王晏清率百余人突出乱军,到达解放区。

这次起义虽未能达到预期目的,但因九十七师身份特殊,在政治上的影响力要远远大于军事上的,这说明,国民党反动政府真的即将土崩瓦解。

国民党“绝密江防图”成了废纸

2008年12月25日,原南京万里皮鞋厂离休干部、86岁高龄的丁明俊老人,激动地走进了刘峰的病房。两位当年共同参加过渡江战役、迎接南京解放斗争的老人,在时隔半个多世纪后首次相会,他们的双手紧紧握在一起。

1949年渡江战役期间,丁明俊的身份是中共南京市委情报系统吉兆营联络站负责人,

她家居住的南京市吉兆营24、26号宅院,就是联络站所在地,而她的丈夫,就是打入国民党江防最高指挥机关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的沈世猷。担任装甲兵参谋一职的沈世猷,经常参加各种重要的军事会议,接触到各种军事秘密文件。长江沿岸有哪些炮台、火力多少、人员配置情况如何,他可以说是了如指掌。

利用工作便利,沈世猷机警地将作战参谋掌握的钥匙弄到手,将绝密的芜湖至安庆之间的江防部署图拿出来。他冒着生命危险,将图带回吉兆营家中,就在这里连夜紧急完成抄录并送出。第二天一早,沈世猷上班时,将江防图放回原处,神不知鬼不觉中,复制图已经被安全地送到位于合肥的总前委指挥部。

三轮车工人的南京“巷战”

1949年三四月间的南京,国民党政府的管理社会职能基本瘫痪,社会治安相当混乱。大批的无业人员聚集城内,还有前线撤下来的散兵游勇、从北方逃亡来的地主,以及乞丐、妓女。在撤离前夕,国民党政府又从监狱里放出大批的盗匪、小偷。

“面对这样的严重情况,市委决定只有把广大人民群众更好地团结组织起来,发动一场南京人自己的‘解放战争’。”刘峰这样形容当时南京人民的行动。

当时,南京的公共

交通工具,大多还是人力车、三轮车,而在三轮车工人中,地下党的力量也较强。于是在4月初,

以三轮车工人为主的人民民主保卫队正式成立了。保卫队共有400多人,分为四个区队,分别是东区、南区、西北区、下关区,工委副书记高骏为总队政委,下关区书记纪浩为队长。保卫队的利用收缴的国民党军队遗弃的枪支武装起来,在国民党政府开始逃跑一片混乱之时,担负起维持社会秩序的重任。他们联合各大商场成立义务警察队,进行联防巡逻,

防止坏人抢劫,保护了从新街口到太平南路、夫子庙一带的南京商业中心。

梁宝英,南京解放前夕在上海的中国航空公司上班,从事地下党外围工作,与南京的地下党员刘峰等人非常熟悉。他说:“那时国民党大官满脑子考虑的是如何保全自身,根本顾不上侦察地下党的活动,一些决定留下来的低级官兵和小公务员,在大势所趋下,也不干预地下党的活动。普通老百姓更是心照不宣,并乐意提供方便。”

他们牺牲在黎明前

父亲唐绍泉已经牺牲61年了,多年来,唐述伦一直在收集父亲的英勇事迹,他甚至在自己的家里立起了3套碑,记述60多年前那惊心动魄的一幕。

父亲唐绍泉被捕的时候,唐述伦还是个12岁的孩子。他清晰地记得那一天的情景。那是1948年的秋天,正在家里的唐述伦突然听到外面有人喊他,“快去看你的父亲,他被人抓走了!”

唐述伦和家人立即赶到父亲工作的单位——铁道南京检车区,这时,唐绍泉已经被押离南京。父亲的尸骨至今没有找到,这成了唐述伦一生的憾事。

唐绍泉牺牲后不久,南京解放。唐述伦不久之后也成了一名火车司机。但唐述伦一直难以忘记父亲的壮举,他东奔西走,拜访了父亲的许多战友,记录下了他战斗的一生。而在唐述伦的叙述中,唐绍泉的事迹也渐渐清晰。



唐述伦在家里立了三套碑,记述父亲的往事

唐绍泉1902年出生于安徽巢县,1926年秋天,经朋友介绍,他来到汉口加入了北伐军,负责押送军需物资。但是,唐绍泉在押车途中,却听到了一些骇人听闻的屠杀共产党人的暴行,他思想上不禁打了个问号。于是,他请长假离开了军队。

1942年4月,唐绍泉考进伪华中铁道南京检车区当技工。

抗战胜利后,国民党抢夺胜利果实,南京城内接收大员满天飞,唐绍泉看在眼里,恨在

心里,他借看管工具室之便,利用讲故事的方式,团结工人,并采用读报方式揭露反动派欺压劳动人民的鬼把戏。时间长了,唐绍泉也成为特务们指定的监视对象。

1947年,唐绍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1948年9月7日,唐绍泉与马绪善等5人同时被捕,转押上海遇害。

和唐绍泉一样牺牲在黎明前夕的地下党员还有:马绪善、陈松驹、张加熙、陈祝三、程履绎、成贻宾……

本版摄影 快报记者 路军